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序

吴泰昌

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不适合给友人著作写序。近年来碰到过几起这类事，均婉言致歉了。唯独金梅的这本《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当作者还未定稿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时，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事后我常暗自诧异，从哪儿来的这股勇气？后来读到一家报纸副刊上一篇谈论作序的杂文，作者提出为什么不能在请名人前辈的同时，也请些同辈乃至晚辈写序呢？文章还列举了文学史的事实来作证。这倒触动了我。我这几年也出版了几个集子，也请过几位我尊敬的前辈写序；金梅去年出版的一本文艺论文集，也是请名家作序的。金梅平日给人的印象，为人和为文都比较谨慎小心，不够大胆泼辣。这次他却带头搞多样化了。在他的启发下，我刚刚编完的一个集子，就请了比我略大几岁的、在艺术和学识上很令人尊敬的一位朋友作的序。

现在，金梅的这本《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的初校样，三百多页的一堆，摊开在我的书桌上。北京少有的炎热天。我刚从湘水流域回来，热的空气和热的记忆使我边看边揩汗，终于读完了。我为作者多年努力的成果高兴，真心实意的。

我和金梅的初识，是三十年前。一个凉爽的秋天，我们分别从江南考入了北京大学，同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新生，临时住在小饭厅里。正式上课前，系主任杨晦教授说可以重新选择专业。初进燕园，陪我在未名湖畔散步的高年级同学是学文学的。受他的影响，再加上羡慕语文专业一口气数不过来的那些闻名中外的教授，我突然决定改学语文专业。这一“突然”，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生活道路。我和金梅的接触，随着宿舍的调整、专业的分道而骤减。一九五八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从

西郊搬到了城里。当年大学生的社交本来就少，说实话，时间不乏，囊中短缺的是公共汽车车票钱，星期天早起只好埋头在图书馆里。虽说同在一个城市里，几年也难得见面一次。一九六〇年，我大学将毕业时，一天在校园里见到金梅，他比我早一年毕业了，留校教书。他说因家在天津，他自愿调走。当时河北省会在天津，他去了河北省文联。此后，他随着河北省会的变异，到了保定，到了石家庄，一直在名称来回变换的一家省文艺杂志社当评论编辑。时代的动乱，不安定，朋友间的走动也就少了，只好彼此在心里相互惦记着。“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想不到和金梅在一起共事了一两年，一个编辑部，一个组，一个办公室。可以说得上是朝夕相处。晚上，九点多钟，我看书看累了，到院子里散步，见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金梅单身，办公室就是他的宿舍——我推门进去，和他闲聊一阵。我一九六四年研究生毕业后就到《文艺报》工作，一九七三年湖北中央文化部干校分配，回不了北京；因我爱人大学毕业后被定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打发到河北深县一所公社中学教书。由于善良热心的河北文艺界的一些师长帮了我的忙——我永远铭记在心的这个大忙，我来到石家庄。不久，我爱人也来了。这个调动过程消耗了我们无穷的精力，金梅也常为此奔忙。深夜，我们谈起了大学时代的往事和一些不知去向的同学，感触丛生。当我离去时，常常过了十点，我劝他早点休息，他总是点上一支烟，微笑着说：再干一会。我想他还要翻一会书。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入睡前总得翻点什么看。这次，才知道他论叶老文学创作的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六十年代初，一九七九年又动手修改。我想，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在静悄悄的夜晚，他肯定在积累资料，作修改的准备。那个年月，现代文学史讲叶圣陶还需要点胆量，他不得不静悄悄地干。我后悔，若早知道他在从事这项工作，当时我虽帮不了什么忙，至少不会几乎每天晚上剥夺他一段时间，影响他静悄悄地工作。

我稍为详细地叙述我和金梅的相识和交往，旨在提醒读者，

书的作者写出这本书，实非易事。这是地地道道的业余之作。他学的是新闻专业，现代文学史只捎带读过；长期的编辑生涯，使他缺乏完整的读书和写作的时间。知难而进，知难而上，这是五十年代许多大学生所追求的乐趣。我打心眼里钦佩金梅治学上的这股韧劲。

我应允写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与金梅同是叶圣陶作品的爱好者，而又认为对这位重要作家研究不够是一种遗憾。而遗憾何止这一点。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光彩的一页。我们的研究工作，显然还没有很好地跟上去。虽然对一两个或几个伟大作家的研究出了一些专著，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整个说来，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即使一向被重视的对鲁迅的研究，也难说成果能令人十分满意。对文学史上存在过的为数众多的，有特色有成就的一批作家单个研究不够，对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认真剖析不够，这势必影响文学史水平的提高。近几年，现代文学史出版了好几部，每部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显示了特色。但总的说，新鲜感不够，材料上或观点上，多少给人以大同小异的印象。我以为，这与对一批有影响的作家缺乏细致的考察有关。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分析研究一批作家的创作，从中引出实事求是的见解。在这个广泛耕耘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这样写出来的文学史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阶梯。前些年，听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有意编辑出版一套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包括作家作品论在内，我很欣赏编者的这种眼力和魄力。现在已经见到一批成果了，其中就有金梅的这本书。在叶圣老九十寿辰之际，也算得是一份薄礼吧，至少表达了读者的一点心意。

叶圣陶是“五四”新文学初期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在现代文坛活跃了七十个春秋。他创作涉及的面广，小说、诗词、戏剧、童话、散文、评论，都有显著的成就。他一生的多半时间是用在编辑和教育事业上，平日为文又严谨，作品的数量不算太多，也有数百万言了。这样一位对我国新文学发展有显著贡献的作家，

这几年才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兴趣。解放前，茅盾、朱自清、夏丏尊等零星写过评介叶圣陶作品的文章；钱杏邨（阿英）一九二八年写了逾万字的《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的论文。解放后，也有不少这样文章，前年出了一本评传和一本从语文角度研究叶老作品的小册子。但对叶老文学创作的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仍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从这个角度上看，金梅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研究叶圣陶文学创作的第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我对这本书的总的印象是，内容厚实，论述较系统、全面、充分，观点较公允、稳妥；在剖析叶圣陶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时，作者提出的看法，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是一部了解叶圣陶文学创作的必读之书。当然，终因条件局限，新近挖掘与发现的材料仍有所遗漏。比如，近年出版的《叶圣陶散文（甲集）》，有半数以上的文章，是初次成集的，其中有些第一次披露是叶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金梅的书中就未能得到反映。

读完本书，在论述上，我感到的一个缺憾是，有些地方多少缺乏一点锋芒。这主要是指在个别存在着尖锐分歧观点的问题上，看不到作者应有的意见。比如说，鲁迅对叶圣陶创作发表过意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给日本增田涉的信中说：“叶的小说，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我不喜欢。”我平日留心鲁迅的这段话，有些研究文章实际上也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我希望在本书中看到金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知是作者忽略了这一材料，还是有意避开了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表态？我有点失望。鲁迅先生是我们最最尊敬的伟大作家，他关于文艺的许多深刻精辟的见解，至今仍给我们以教诲。但是，对文艺作品的欣赏与评价，再有慧眼的人，也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在对待一些作家、作品的看法与爱好上有不一致，是正常的现象。中外文学史上这类例子并不鲜见。罗曼·罗兰就不如我们现在这样推崇巴尔扎克老人。而对罗曼·罗兰的作品，当时法国文坛，也不如今天我们中国研究者评价那么高。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自然有客观标准，

但不一定每个大作家和权威所发表的每一个具体意见都是真理，都是定论，就一定全面，一定正确。所以列宁一再告诫人们要将党的领导者对文艺的具体意见，与党对文艺的主张区别开来。我个人对鲁迅先生谈论叶圣陶小说创作的那段话，有不敢苟同的地方。喜欢不喜欢，这是个人的欣赏口味的问题，可不讨论。主要是立论的那句话。我以为，综观叶圣陶小说的全貌，得不出“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的结论。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创作理论问题。什么才算是写“身边琐事”？文学反映社会生活，题材的大小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题材本身所包涵、所沾濡的社会意义的大小。鲁迅先生一些被公认为杰作的小说，如《一件小事》，就题材而言，很难说就不是“身边琐事”，但它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叶圣陶的小说，几乎都是写他熟悉的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生活，何况他还写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不能一概说，这些生活都是“身边琐事”。叶圣陶的多数小说，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次是，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对叶圣陶小说作这样的概括，也不符合叶圣陶小说的发展实际。如果说，叶圣陶从辛亥至“五四”前后，有些小说对时代的脉搏把握还不够，那么“五卅”之后，他创作上的这一弱点得到了很大的克服。长篇《倪焕之》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部长篇，生活之厚实，时代气息之新鲜，艺术描绘之精致，使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杰作。茅盾推重《倪焕之》是近十年来的“扛鼎之作”，说“这样‘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识地继续做下去，将来我们大概可以说一声：‘五卅’以后的文坛倒不至于象‘五四’时代那样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了”。我的上述理解不一定对。借此就教于读者和本书的作者。我之所以说这层意思，是期望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有更强的针对性、论争性。正确的意见往往是在争辩中形成的，稳定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鼓励和发扬学术上的勇气。在我看来，即使与学术权威的“定论”相左，只要是认真从可靠的材料中引出来的

结论，就要敢于发表。这样，我们的学术水平才可望大幅度提高，研究者也才能形成鲜明的个性。而这，又需要有学术上的民主空气作保证。

读罢书稿，还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作为文艺评论家的叶圣陶，也应该引起我们研究者的重视。“五四”以来，许多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写了大量有特色的评论文字。不象我们现在分得这么一清二楚：作家就是作家，评论家就是评论家，编辑就是编辑。三者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熔一炉于一人，叶老就是这样的一位多面手。他一生写了数十万字的评论文章。解放前的多侧重于语文角度，象《文章例话》里的那些篇什，但，其意义决不仅仅停留在文章结构和语法修辞的推敲上，涉及到对文艺新作的评价和理论问题的探求。例如，一九三六年夏衍的报告文学名篇《包身工》发表不久，叶老就对此加以热情评介。通过对作品入微的剖析，阐述了报告文学的特性，呼吁这一新型文学样式的蓬勃发展。解放后，叶老的主要精力在教育事业上。他写了一些作品，散文多，小说只一篇。评论文章不少，大都收在《叶圣陶论创作》一书中。叶老对新的创作十分关心，能看就看，不能看就听广播或由家人诵读。记得一九七八年《文艺报》复刊时，我去向叶老求援。他说正在听广播一部小说，听完了，若有想法再说。后来至善来电话叫我去取稿，是叶老听完这部长篇小说后写的随想。这就是发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期《文艺报》上的《我听了〈第一个回合〉》。叶老评论文章，长短不一，短小的居多，文风朴实，亲切自然，毫无一个大作家说大道理的架子，写法自如，角度多样，给人以切实的东西。这两年作家兼写评论的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现象，既扩大了评论作者的队伍，又丰富了评论文章的品种。作家的评论文章活泼清新，更能道出同行的创作甘苦，自然也有它的短处。如果认真总结一下叶圣陶在评论上的成就，不仅对全面评价这位人品文品均为人敬重的老作家是必要的，而且对发展今天的文艺评论也大有益处。金梅的这

本书题名已限定论述的只是叶圣陶的文学创作，评论不在此书的视野之列。我不是责怪金梅有什么遗漏，而是想应该有人研究这个选题。

——话扯远了。开头我就说过，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不适合为友人写序。

一九八四年七——八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吴泰昌 2
第一章 生平、文学活动概述	11
第二章 逆流中的现实主义创作	27
——“五四”前的文言小说	
第三章 在卑琐灰色生活中向往着“美”和“爱”	47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的创作（上）	
（一）“五四”时期的创作思想	48
（二）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和《线下》	52
（三）诗歌和散文创作	81
第四章 在卑琐灰色生活中向往着“美”和“爱”	107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的创作（下）	
（四）戏剧创作：《愚亲会》和《艺术的生活》	107
（五）童话集《稻草人》及其它	121
（六）本阶段的创作小结	140
第五章 在时代的激流中不断发展	149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的创作（上）	
（一）五卅运动对叶圣陶创作思想的影响	149
（二）《五月三十日》、《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及其它诗歌散文创作	156
（三）短篇小说集《城中》、《未厌集》及其它	168
第六章 在时代的激流中不断发展	186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的创作（下）	
（四）长篇小说《倪焕之》	186

	(五) 本阶段的创作小结·····	216
第七章	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继续前进·····	225
	——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九年的创作(上)	
	(一) 散文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及其它	226
	(二) 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及其它·····	234
第八章	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继续前进·····	250
	——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九年的创作(下)	
	(三) 短篇小说集《四三集》及其它·····	250
	(四) 抗日战争时期的诗词创作·····	263
	(五) 本阶段的创作小结·····	274
第九章	对新生活的热烈歌颂·····	283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创作	
	(一) 游记散文集《小记十篇》·····	284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诗词创作·····	288
第十章	一个有艺术特色的作家·····	296
跋	·····	331

第一章 生平、文学活动概述

叶圣陶，原名绍钧，圣陶是他的字。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叶仁伯，职业是账房，为一家姓潘的地主经管田租。母亲朱氏，管理家务。

①

一九〇〇年，叶圣陶六岁时，进入私塾读书。“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都要读熟，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得出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要理书，就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背给老师听。”^②就这样，叶圣陶在私塾中读了四五年。到一九〇五年，十一岁时，父亲要他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未能考中。这期间，由于受国内革新运动的影响，叶圣陶常与同学、好友顾颉刚、王伯祥等一起，慷慨激昂地议论着国家大事和人生要义。一九〇六年，叶圣陶十二岁时，由私塾转入小学读书。由于成绩优异，读了一年，便考入苏州新创办的草桥中学。五年后的一九一一年冬季，毕业于该校。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十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叶圣陶密切注视着此次革命事态的发展。他几乎天天去车站、茶馆，等候新到的

①本书中关于叶圣陶生平事迹的介绍，除采自其有关的自述文章，还参阅了商金林编辑的《叶圣陶年谱（上辑·初稿）》，《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4期、1982年第1期；以及顾颉刚《〈隔膜〉序》，《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3月版。

②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

报纸，急欲得知全国各地起事的情况。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苏州城亦于十一月五日光复。打倒皇帝，剪掉辫子，开会庆祝，入学团着校服，荷枪挎刀，射击打靶，列队出巡，和友人相聚谈论评说，写诗作文赞颂革命，探讨改革，^①……“风云际会，盛哉此时”^②，叶圣陶很是欣喜若狂了一阵。他以为，“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③。但是，正象他后来所回忆的：“看看事实，似乎跟理想中的革命不大对头”，这就使叶圣陶在“莫名其妙的高兴”中，“又感到莫名其妙的忧虑”了^④。而不久，由于家境贫寒，无力升学，叶圣陶就开始当了小学教员。

从一九一二年起，将近十年时间，叶圣陶在几所小学任教。先是在苏州城内的一所初等小学当二年级主任，教国文，也教算术。对于教育，叶圣陶是有一番美好的愿望的。他以为，通过教育，能“使醇醇诸穉展发神辉”；于自己，“亦此生一乐”^⑤。以其温厚的性情，叶圣陶“原是和小学生聚得下淘的”；但由于他看不惯那些目光短浅的同事和“象煞有介事”的视学，不愿意和他们合作共事，因此，三年后，终于被挤出了学校。在家闲居了一年多时间。^⑥一九一五年秋天，经友人郭绍虞介绍，叶圣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任国文教员，并为该馆编写小学国文课本。一年多以后（一九一七年春天），又应同学好友吴宾若的约请，转入苏州东南的用直镇高等小学担任教职。吴宾若是该校校长，

①据叶圣陶《辛亥革命前后——日记摘抄（一）》记载，叶圣陶于一九一一年前后，曾在《大汉报》、《妇女时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大汉天声》、《论贵族妇女有革除装饰奢侈之责》、《儿童之观念》等诗文。他在热情赞颂革命的同时，对改革各种陈规陋习尤其是心理上的旧习极为重视，认为：“其余当从根本谋，改革尤须改革心。心犹旧习新何有，革之惟有痛规箴。”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②③叶圣陶：《辛亥革命前后——日记摘抄（一）》，《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④叶圣陶：《革心》，《抗战文艺》1946年第10卷第6期。

⑤叶圣陶1913年10月12日写给顾颉刚的信，转引自顾颉刚《〈隔膜〉序》，《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3月版。

⑥参阅顾颉刚《〈隔膜〉序》，《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3月版。

同在该校的还有另一位同学和好友王伯祥。他们意气相投，目标一致，对于教育有着共同的设想。叶圣陶以为，自己对教育的美好意愿，有了实现的可能，胸中充满了希望。在用直的五六年中，叶圣陶和吴宾若、王伯祥等人一起，实验着一整套新式的教育方案。办农场，开商店，造戏台，设备展览馆、阅书室，自编课本，定期召开同乐会和恳亲会，有些课程不用书本，用语体文教授，等等。据顾颉刚回忆说，在用直的五六年中，叶圣陶是“沉浸在爱的空气里了”^①。这个时期他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早晨，到用直镇西的晓市观察民情风俗，了解歌女等底层人民的生活；晚间，则去学生家中走访，关心贫苦农民及其子弟的生计。在教学中，叶圣陶不但教书，更重视教人。他每每告诫学生，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直镇上有陆龟蒙的遗迹，叶圣陶和吴宾若等教师，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瞻仰陆龟蒙的衣冠墓，讲述这位先贤的生平和他那揭露现实、同情农民的诗文。在这种场合，叶圣陶则谆谆教育他的学生说：“先贤高洁，是百世之师。今天，时代不同了，你们要入世为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用直，师生们激动不已。他们在学校操场上召开了宣讲会，叶圣陶在会上大声疾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以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之后，他又和王伯祥等创办了《用声》文艺周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潮。在用直的五六年中，叶圣陶和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里的学生和群众，一直是很怀念他的。这段生活，无疑地对叶圣陶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一九二一年秋季到一九二三年春天这段时间，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一些中学和大学，倾慕于叶圣陶的文名和人品，曾先后聘请他为教员，但时间都不长。从一九二三年春天起，叶圣陶

①参阅顾颉刚《〈隔膜〉序》，《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3月版。

②此处叙述的叶圣陶在用直的生活情况，参阅了顾颉刚的《〈隔膜〉序》，《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3月版；商金林的《访叶圣老的第二故乡——用直》，《钟山》文学季刊1981年第1期。

离开用直，进入商务印书馆。这之后的十余年间，他虽不时地还在上海的一些中学和大学担任过教职，但都是兼职。他的主要职业，就一直是书店的编辑。一九三〇年底，他由商务印书馆考入开明书店。开始是一般编辑人员，以后成为书店负责人之一。

在这十余年间（一九二三——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动荡的年代，叶圣陶的个人经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叶圣陶很快结识了早期共产党人沈雁冰、沈泽民、杨贤江、瞿秋白等人，并开始接触到了一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这无疑地帮助他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革命热忱。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之后，叶圣陶的家成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左翼组织活动的地点。“五卅”事件中，叶圣陶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目睹了中外反动派镇压人民的凶残狠毒。在惨案发生后第四天，他和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编辑出版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机关报《公理日报》，对英日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走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该报由于经费支绌不得不停办以后，叶圣陶又创办了以揭露黑暗、抨击时政为宗旨的《苏州评论报》。一九二六年五月，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时，叶圣陶受党的委托，创办和主编了中国济难会的机关刊物《光明》杂志，为营救、援助被捕革命者及其家属积极工作。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叶圣陶受革命政权的委派，曾到苏州接管过学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又回到上海。由于原来的住处曾为进步组织联络点之事暴露，加上他的夫人胡墨林，也曾被委派接收上海最大的女子学校——务本女学（后因病未去），传闻敌人要搜捕她，为了安全起见，叶圣陶不得不搬了一次家。这期间，叶圣陶目睹耳闻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种种怵目惊心的惨酷事实。他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上海分校任教时结识的共产党人侯绍裘（曾任上海临时革命政权的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捆进麻袋后用刺刀刺死，沉尸秦淮河中。

也就在这一年——一九二七年秋，鲁迅来到上海定居。叶圣陶与鲁迅、沈雁冰、冯雪峰等是近邻。就从这时开始，或登门拜访，或书信往还，叶圣陶与鲁迅有了较多的接触。

三十年代初开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镇压，在进行多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了一系列文化围剿；而日本帝国主义则长驱直入，步步进逼，大有吞并中国之势。在这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叶圣陶满怀义愤，和鲁迅、茅盾等革命作家并肩作战，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求实等左联五位青年作家。叶圣陶与夏丏尊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元老、开明书店董事邵力子先生，请他为释放胡也频等人助一臂之力。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叶圣陶又与夏丏尊一起立即发表了《知与情意》的联名文章，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叶圣陶与夏丏尊、周建人、胡愈之、郁达夫、丁玲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并被推选为该盟机关刊物《文化通讯》的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战事，无数房屋被炸毁，市民们惨遭无辜之害。叶圣陶所在的开明书店和他的家，也遭到了炮火的袭击。在战事发生后七天——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叶圣陶与鲁迅、茅盾、陈望道、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二月七日，又与鲁迅、茅盾等一百二十九名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了《为抗议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一九三三年五月中，丁玲等人被捕后，叶圣陶与蔡元培、胡愈之、邹韬奋、郁达夫、柳亚子等三十九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强烈要求立即予以释放，还参与了营救被捕人员的募捐活动。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为迎合日本侵略者的意愿，推行和鼓吹其不抵抗政策，掀起了一阵尊孔读经的复古风时，叶圣陶写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政论文章，并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和上海十八个文学团体和文化界

一百三十多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书，鲜明地表示了反对复古的态度。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叶圣陶又和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叶圣陶于九月间，扶老携幼，长途跋涉，由苏州西行，先到武汉，后又入川，在重庆、成都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并编辑《中学生》等刊物。在抗日战争的整整八年中，叶圣陶历尽艰险，饱经沧桑。但他始终自守着志概与节操，还通过手中的一支笔，不断地批判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逐步加深，他的斗争精神也越发坚定有力了。素以脾气温和著称的叶圣陶，现在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及其有关宣传，也难以平心静气、温文尔雅了。据朱东润在《恒言之役》一文^①中回忆：一九三九年秋，当他们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在一次语文测验中，校方竟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题目，让一年级新生把柳宗元的《佩韦赋》译成所谓“恒言”。朱东润在回忆文章中说，不要说一年级新生不能理解柳宗元的这篇高论，“即使理解了，那么，‘韦之申申，佩于躬矣；本正生和，探厥中矣’”，是不是要学生们在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时，去“追求和平，为侵略者开辟一条招降的道路”呢？至于何谓“恒言”，更是谁也弄不清。当时，叶圣陶和朱东润、高晋生三人被指定为监考，又让其阅卷评分。面对校方的这种荒唐卑劣的做法，叶圣陶主动起草，给教务处写信，坚决拒绝阅卷。这一行动，一时被称为“恒言之役”。也是在武汉大学时，有一次，叶圣陶在听说了一个学生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以后，愤慨异常，直骂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灭绝人性。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不断增长的同时，叶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愈来愈亲密深厚起来。他曾鼓励其一心想参军抗日的小儿子叶至

^①东润：《恒言之役》，《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诚说：“要出去，应该到延安去！”就是这样，叶圣陶抱着“不扫妖氛誓不还”的决心，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定能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在西南各地，度过了整整八年的漫长岁月，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旬，他带着一家人，搭乘破旧的木船，经过四十多天的冒险航行，返回上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亲朋故友。

回到上海后，叶圣陶仍在开书店工作，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从抗战后期开始，叶圣陶就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真投降、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有所认识和揭露。现在，他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发动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的激流中，为实现和平、自由、民主而斗争。新中国建立前夕，叶圣陶怀着“兴奋的心情”，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召唤，绕道香港到达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叶圣陶即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以后，他曾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被选为常务委员。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担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一九八三年六月，在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

叶圣陶是“五四”以来我国杰出的作家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有突出的地位的。

叶圣陶对文学写作，很早就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来源于他自幼对中外文艺作品的广泛接触。他在《“说书”》一文中追忆说：“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象《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象《三国志》、《金玉传》、《水浒》、《英烈》，都不止听了一遍，最多